

认知视角对深化“文学性”研究的意义

A Further Look at “Literariness”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邓 忠 (Deng Zhong) 刘正光 (Liu Zhengguang)

内容摘要：“文学性”在近几十年成为文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其定义尚处在含混多义的状态。本文认为当前的语义含混在一定程度上与脱离语言分析和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文学研究传统有关。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定义出发，重点阐述认知视角下文学性的含义，提出文学性是文学语言—概念化—哲学探索的连续统这一新解读。本文认为，这样的解读同时可以良好回应、澄清或映证传统文论的某些看法，因此为打破学科间壁垒、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可行思路。

关键词：文学性；认知视角；概念化；哲学探索

作者简介：邓忠，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认知诗学；刘正光，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认知诗学。

Title: A Further Look at “Literariness”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ocuses of recent literary studies, “literariness”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a wide range of perspectives, resulting in obscurity in what it really mea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obscur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studies that feature a departure from language analysis and linguistic paradigms. Starting with a brief illustration of “literariness” in the realm of formalis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ound and clarify it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and comes up with a conclusion that “literariness” is a continuum of literary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 and philosophic explorations. Such a conclusion is desirable in terms of eliminating barriers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riness; cognitive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philosophic exploration

Authors: Deng Zhong, is Ph.D Candidate at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410082), as well as Lecturer a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41), specializing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poetics (Email: icodehere@126.com). Liu Zhenggua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410082). His major interests include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poetics (Email: bwzgliu@126.com).

“文学性”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文献中并不鲜见，语言学等领域也都在使用这一概念。但迄今为止，这一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含混状态，导致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难以就“文学性”及相关议题进行有效交流，更导致文学、语言学等学科间出现不少以因误解和讹传而形成的壁垒。在文学研究领域，目前“文学性”的定义或解读林林总总（史忠义 122-28），但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导致一部分学者主张放弃严格界定，一部分学者试图借助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路进行阐释，甚至有部分学者试图另起炉灶、重新定义。笔者梳理了一下近二十年“文学性”一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发现其语境至少有：1）分析某一作品或文学样式的“文学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文学、诗学和美学意义上的作品赏析；2）探讨文学性与其他学科及其相关术语的关联，尤其是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系；3）为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划定范围，尤其是在迪伦以民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种讨论越来越多。

在语言学领域，“文学性”最早由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和诗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提出¹，旨在界定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征。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把文学冠以“科学”的字眼，这意味雅各布森认为文学并非不可描述和不可解释，而是具有与其他科学相似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二是不把文学作品本身视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这表明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受到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区分的启发，即正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个案性、零散性的言语，而是规律性、系统性的语言一样，文学科学所探讨的对象——文学性——也具有同等的规律性和系统性。为了更加清楚地阐明文学性，雅各布森给出了如下定义：

文学性，换言之，是词语进入诗歌主题时的变形及由此变形产生的程序系统，是每一个语言学家在分析诗歌时的主题。与按照文学批评标准的责难正相反，这种方法引导我们走向文学活动规范的考察，因之而开启通向自身所暗指的一般规律的道路。（转引自胡涛 41）

这一定义表明，文学性需要通过语言层面的“变形”及其“程序系统”来体现，这实际上提出了语言学与文学之间产生联系的可能和方式，那就是

1 关于雅各布森到底何时提出这一概念还有争议。参见胡涛：“雅各布森与‘文学性’概念”，《外国文学研究》3（2014），37。

通过对语言特定形式的考察来发掘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可见，这里言及的“文学性”跟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性”并无明显关联。形式主义以后，文学和语言学在其范式发展历程中交集甚少，两种学科视野下的“文学性”自然相去甚远。再加上文学理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发展迅猛，新批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相继涌现，而这些流派要么跟语言学的关照进一步分离，要么对语言学的进展不甚敏感或者误读，从而加剧了今天的“文学性”语义含混局面。

一、语言学角度阐释的原因

当然，也还有学者沿着雅各布森语言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试图找到语言学维度的文学性对于文学和文学语言的特有解释力，但这在当前文献中还比较式微。可以说，现有文献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跟语言学范式越走越远。笔者认为，这样远离语言学的研究理路固然成果丰硕，但存在着先天的不足，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文本都是由语言作为媒介的，作者的任何创作策略（无论反映何种情感、价值观或是美学体验等）都首要反映在语言运用的策略上。雅各布森从语言学角度对文学性的定义虽然有其自身局限，但学界因为这些局限而将其抛弃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忽略了该定义对于文学问题研究在视角、方法、方式上的启发意义。

第二，俄国形式主义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语言学流派，而现代语言学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新的学派、视角、方法和理论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对于语言的认识。那么，因为形式主义的不足而否定其他语言学流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显然是机械的思维。事实上，自形式主义起，结构主义、生成语法、功能学派、认知学派等视角和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几乎都有着可以借鉴的地方。

第三，无论对文学作品进行何种分析或解读，文本的意义都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忽视或轻视文本意义而去探求文学作品在其他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对于文本意义研究在语言学视野下成果斐然，从生成语义学到功能语法学说，再到以语义研究为核心的认知语言学，都有可能为文本意义研究提供有益思路。

第四，与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文学性”讨论构成清晰参照的是，过去一长段时间内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走得越来越近。这本身是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成果，但在这些学科视野下，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往往不是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研究出现了一定的异化，需要找到新的切入口和成长点（阿尔达马（Aldama）和霍根（Hogan）vii）。

因此，本文试图从形式主义出发，重点阐述认知视角对于“文学性”概念的界定和研究的优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认知视角下“文学性”的新解读。

同时，我们认为以认知为基础的阐释也可以对于文学研究领域关于“文学性”的某些看法做出回应和澄清，服务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继续深入，也服务于文学和语言学的深度联姻，以消弭因术语阐释沟通不畅而可能导致的误读和壁垒。

二、诗歌语法：文学性研究的开始

形式主义视野下与“文学性”关系十分紧密的一个概念是“诗歌语法（Grammar of Poetry）”，该概念也由雅各布森提出，其基本内容是：诗歌是由语言所写就的，而语言是受其语法系统制约的，因此，诗歌也应该受到一定语法规则的制约（雅各布森，“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128）。这里的诗歌语法规则不等同于一般自然语言的语法规则，而是诗歌所特有的，因为诗歌的语言跟一般的自然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别，是一种对于普通语言的系统歪曲（转引自张旭春 102）。雅各布森提出“诗歌语法”这一概念的意图正是在于用一套规则体系对诗歌的“文学性”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发现，诗歌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索绪尔组合/聚合关系的观点，认为诗歌的独特性来自于诗歌语句在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上的变形。通过这种方式，雅各布森达到了以诗歌语法为方法来探讨文学性的目的，并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和指导的文学研究的先河。

然而，雅各布森的观点十分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强调诗学价值对于语言规则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们的主观感受在文学阅读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可能，这实际上是“心智”的缺位。心智的重要性很明显体现在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审美过程中，东西方文学研究都强调心智和以此为基础的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从而解释文学的特质和魅力（史忠义 122-128；杨匡汉 183-219；斯托克威尔，《认知诗学导论》1-13）。而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认知诗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同样重视心智研究，认为语言与心智有着系统性、全面性的、符号性（symbolic）的联系，即发生于心智层面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有理有据地反映于语言的各个不同层面（束定芳，《外语教学》4）。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形式主义中走出来，而在认知诗学和认知语言学中获取答案，探讨语言—心智—文学三者的协同与互动。

三、认知诗学：文学性研究的深化

认知诗学是一种基于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认知科学的，对整个文学活动过程——既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阅读——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范式。认知诗学这一名词最早由以色列学者泽尔（Reuven Tsur）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其目的在于将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文学作品分析和文学理论的探讨。我们认为，在将认知视角引入文学研究以后，文学研究实质

上在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上确立了心智的地位。下文从两个方面具体阐释：

（一）心智作为语言和文学的共有基础

在认知诗学尚未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派之前，特纳（Turner）关于文学与人类心智的研究和莱科夫（Lakoff）从事的借助文学作品的概念隐喻研究等已经为这一学科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特纳经过大量细致地梳理英语文学作品（尤其是寓言等其他叙事文本），发现文学心智（literary mind）是人类心智的基础——故事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中心原则；寓言（即故事的映射）是日常推理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因为寓言使得人们可以理解时间和空间、理解自身和他者以及进行推理和归纳（特纳 12-25）。他推演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乔姆斯基等人观点的结论：故事、映射和寓言先于语法出现，没有这些心理能力，将不可能出现语言。语言只不过是文学心智的孩子（“the child of the literary mind”）（168）。这一观点虽引来不少争议，但其贡献不容忽视：1）提出语言是心智的产物，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体现出涉身性（embodiment）和主观性（subjectivity），而不是仅仅受到审美规则或特定语境制约那么简单；2）人类的心智具有文学和故事色彩，故事中所体现出的关于世界和自我的概念化过程是人类心智能力的重要体现。那么，就文学、语言和心智的关系来看，特纳的主张可以这样总结：人类的文学心智既是语言的源泉，又是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基础，因此，文学和语言是具有共同心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接口。

与特纳大致同一时期的语言学家莱科夫等人从概念隐喻的角度也对文学作品和语言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文学、语言和心智建立了另一种桥梁。他们发现，概念隐喻是人们语言运行和表达的基本方式，无处不在；人们的心智中存在着若干高度抽象化的概念隐喻，如 LIFE IS A JOURNEY，人们关于“人生”这一话题的语言交际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一隐喻。将这一观点推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可以发现，概念隐喻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存在的天然接口论，这是因为，特纳虽然提出文学心智这一观点，但并未明示文学心智是如何与语言形成对应关系的。概念隐喻部分解答了这一问题：文学心智可能借助概念隐喻，使得文学作品中实际出现的语言在本质着上浸染文学心智的特征，因而使得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这可以视为从认知视角出发对何为文学性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例如，上文所讲的将人生比作旅程的隐喻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存在，甚至构成了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这一隐喻将人们经验世界中关于人生各种问题的遭遇和思考转换为现实世界中关于一段旅程的涉身化体验，从而搭建起心智和文学的联系：人们读到的是旅程中的人和事件，但旅程实际映射的是人类心智加工处理后的关于人生的概念系统，这一概念系统反映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

（二）概念化作为语言和文学的共同解释

如果说特纳解释了文学和心智的关系并指出语言产生于文学心智，

莱科夫等论证了心智和语言可以通过概念隐喻进行联通从而产生文学作品,那么关于语言和心智间具体联系和互动方式的解释则是来自于兰盖克(Langacker)和托尔密(Talmy)。兰盖克的认知语法重新定义了语言,认为语言是形式和意义有机结合的整体,是由约定性语言单位组成的结构有序的清单库。认知语法旨在发现和讨论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与语言使用的关系,尤其是概念化对于语言意义的重要性,这恰好可以解决文学中语言如何具体与心智联通的问题。托尔密的研究则致力于描述与解释语言中的概念结构,阐明语言的语法子系统和词汇子系统的概念的本质,并创立图示系统及构型结构的理论,这对我们理解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两位学者的贡献使得认知语言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近几十年取得长足的进展,从而推动了认知诗学的发展。

在直接从认知语言学获取灵感的认知诗学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托克威尔(Stockwell),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把对“文学性”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学界一般认为他在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是认知诗学成为显学的起点。在这部作为教科书的作品中,斯托克威尔将他的认知诗学观做了如下阐释:1)认知视角介入文学研究的原因和重要性(文学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日常经验和认知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学阅读涉及到人们的认知操作);2)哪些认知学说可以帮助文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如图形与背景、原型范畴与认知模型、认知指称、认知语法、脚本与图示、概念隐喻、可能世界、语篇世界与心理空间等);3)如何使用认知学科的方法去进行具体的分析(为每种研究手段提供具体的案例)。跟这本书并称为姊妹篇的《认知诗学实践》(*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2003)则试图走出教科书的视阈,从更高层次的理论角度探讨认知诗学的应用价值,并进一步探讨了认知诗学的内在组成以及与其他诗学的区别和联系。我们认为,这两本著作是自泽尔提出认知诗学概念以来最为基础和系统阐述这一学科理念和范式的作品,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斯托克威尔所自述的“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认知诗学导论》18),更重要的是,他关于认知诗学的观点不但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学-心智-语言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更细致明晰地描述了认知机制作用于文学和阅读体验的具体方式,具有开创性意义,总结如下:1)自然语言和文学语言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构成连续统(都源于普遍的认知能力)。这看似是对雅各布森的全盘否定,但实际上是细化了雅氏的观点并提出了他没有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文学语言是自然语言有组织性的扭曲,那么这种扭曲的认知动因是什么?如何解释这种扭曲所对应的诗歌语法规则的合理性?很显然,这些问题都跟心智研究有关,答案需要通过认知分析来获得;2)文学分析跟自然语言的分析都离不开对于语言本身意义的理解。这一观点实际上批评了文学理论界“去语言化”、“泛意识化”等倾向,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重语言的诗学传统一脉相

承。但在这里，对语言的关注已经从雅各布森等人对结构和功能的重视转移到对意义和意义背后的概念系统的重视（如兰盖克的意义百科知识观、语法结构本身有意义的认知语法观等）。这一转移体现了对文学语言的把握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旨在为文学性提供完整统一的解释；3）将“文学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化。斯托克威尔等学者的初衷虽然不是系统深入地解释文学之为文学的各种因素，但他们的研究使得“文学性”的看法有了新的内容：文学性不应只从形式、结构等维度考量，也应去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概念化过程与特征等问题。实际上，“文学性”这一概念已经从结构主义开始走向了认知维度。到了2009年的《文本肌理：文学阅读的认知美学》（*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斯托克威尔在全书第一页用了更明晰的文本性（textuality）和文本肌理（texture）来表明文学作品及其阅读的某种共性：文本性是人们共有认知机制的产物，表现在文本与阅读之中。文本肌理是被体验的文本性（1）。我们认为，这一表述使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更为丰富，这是因为它解释了文学所共有的、并使其之所以是文学的某些特质。不同的是，这些特质与普遍的认知能力有关，并在阅读过程中激活了人们的涉身体验和概念化过程。

四、认知语言学：文学性研究的新发展

如果说形式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性肇始并受制于一套有别于普通语法规则的诗歌语法规则，认知诗学关照下的文学性离不开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操作，但要更为充分解释文学性的内涵，我们还有必要更进一步进行阐述。从上述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关键词——语言和概念化：语言是我们探讨文学性的物质基础，概念化架起了语言与文学间联通的桥梁。因此，我们试图继承并改良雅各布森文学性的概念，籍此使得对于文学性的讨论既不脱离其重视语言、重视客观性的初衷，又能在人的普遍认知能力和方式层面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讨，以期系统阐述人类心智、文学、语言三者深层次的联系，从而获得文学性新的解读，同时为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破除误解和壁垒提供一种可以借鉴的范式。鉴于此，我们认为文学性是文学语言 - 概念化 - 哲学思考的连续统，具体界定如下：

- 1) 文学性以文学语言为物质基础。
- 2) 文学性以对人类自身和世界的概念化为实现路径。
- 3) 文学性的本质体现出人们以文学为手段的哲学思考。

就第一点来看，这既是对雅各布森诗学语言学重语言、重规律这一基本理念的继承，又凸显出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法）的理论诉求，即把语法视为一种重要的概念工具，人类借助语法可以理解以及参与世界（兰盖克4）。这表明：1）认知语言学并不反对寻找语法规则（可以推及并不反对雅各布森寻找文学语言“规范”的努力）；2）语法所连接的双方分别是语言与

人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概念化。沿着这个路子，束定芳在分析汶川地震诗歌的基础上，对诗歌语言的“诗意”的解释可以看做认知视角解释文学性的一个有益尝试：

诗歌是表达强烈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强烈的感情往往导致诗人与日常思维不同的概念化过程（想像）。这一概念化过程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手段表达。当诉诸于语言手段时，语言的每一个层面（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形式部分都可以作为诗人进行雕琢的原材料，以表达相应的情感。这些语言形式对日常语言的偏离就是诗意的来源。（束定芳，《外国语文》1）

虽未直接言及“文学性”，但“诗意”的提法明确指明了这是诗歌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重要特征（这与雅各布森文学性的解读一脉相承），且这一特征与概念化息息相关，因此束先生的研究对于理解文学性很有启发意义。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不少其他学者从认知角度出发，以研究文学语言为途径，把对文学作品效果和特质分析进一步推向深入。刘正光研究了汉语诗歌中的名词短语并置现象，讨论了这一现象的基本特征，并从非范畴化和图形-背景逆反这两个角度解释名词短语并置所带来的文学效果。高原探讨了古典诗歌中数量名结构所体现的绘画美，认为这种美感的来源是认知层面的概念合成。熊沐清认为认知诗学的一些主要范畴不但可以解释文学作品的意义，还具有审美潜能，本身具有审美的指向性。这表明从认知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论尚未发现的文学特质。换言之，认知途径可以为文学性赋予新的内容。上述的研究不但体现了文学性以文学语言分析为途径的观点，而且表明文学性在认知范式下被进一步解读甚至重新定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而成为对文学性界定的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第二点而言，我们如果承认文学性蕴于语言之中，必须就要承认文学性也蕴于心智层面的概念化之中。如上文所述，概念化是文学与语言二者产生联系的纽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兰盖克指出，这一术语几乎包括了各种大脑活动，其中重要的如：1）原有的和新的概念；2）抽象的或智力“概念”，以及直接的感觉、运动和感情经历；3）非即时的、逐渐展开的概念；4）对物理、社会和语言语境的完整把握。简言之，语言意义被看作是物理体现、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人脑的心理活动的结果（参见束定芳，《外语教学》3）。除此之外，托尔密非常详尽地阐述了人类的语言（主要是词汇和语法结构）与空间、时间、运动等概念系统的联系，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在概念化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99-177）。以此为基础，国内明确将概念化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是束定芳，在考察王国维以“境界”说为代表的诗歌理论的基础上，束文认为“境界”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学

说有很大的共通性，即可以通过对概念化过程的考量来解释之前难以解释清楚的“境界”（束定芳，《外语教学》3-5）。我们知道，“境界”、“意象”、“神韵”等同义或近义词汇长期以来出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文献中，它们连同很多其他类似的词汇虽然难以明确定义，但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极为重要的特征，其诗学和美学价值备受推崇。束先生以概念化为切入点，将这些语义模糊的词汇进行统一解释，体现了概念化这一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特质的强大解释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概念化作为认知视角下一个重要的术语，其运行方式、过程和特征难以笼统地阐述清楚。因此，结合文学作品的普遍特征，我们将文学性的概念化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 1 “我”是谁？
- 2 “我”在怎样的世界中？
- 3 关于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 4 “我”面临什么样的未知？

这里，“我”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作者创造的角色，即文学作品中具有一般认知力和识解力的个体或群体。这样的个体或群体生活在特定的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设定中，并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历多种事件、形成多种体验、遭遇多种问题、构建多种知识、做出多种行为、进行多种预判。这既是一个体验和发现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自我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做出决断和预测未来的过程。不难看出，这些过程体现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因此理应作为文学性的核心问题体现在任何一类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们呈现出一条完整的逻辑链：人类对自身的概念化 → 人类对世界的概念化 → 人类对于知识的概念化 → 人类对于未知的概念化。换言之，这四个概念化的过程 / 特征就是的文学性实现的途径。

就第三点来讲，哲学思考意味着文学性所体现的概念化过程的目标性和深刻性。这一点体现了文学异于其他语言和艺术形式的特殊品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81）换言之，文学并非生活的平实记录，也非情感的直白宣泄，而往往带有某种启迪性和道德性力量。这种力量常常是人们认为文学作品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原因。而严格地看，这种力量本质反映的就是人们以文学为手段的各种思考，这些思考在本质上都指向关乎人类对于自身和世界重大问题的理解和处置，因此具有相当高度的哲学性（虽然不是以哲学的语言和形式呈现），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时空、长盛不衰——因为它们所关涉的问题和情感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所关注或珍视的。这种哲学思考是以文学语言为媒介、以特定概念化方式和过程为基础来实现的，理所应当被视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更进一步地讲，上文所提及的概念化四个核心问题在本质上也具有哲学意味，与本体论、认识论等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

在英国著名文论家赛尔登 (Raman Selden) 所著《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一书的序言中, 作者“对文学及其背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5), 这些问题是西方文论所关心的核心议题, 并在文论史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答, 但相关的讨论一直持续。作者一共列举了五个问题, 我们发现, 这其中有三个问题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我们所探讨的认知维度的文学性的内涵, 尤其是文学的哲学维度:

1. 文学指向或者说对应于某些文本外的现实吗? 文学所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真实”?
2. 作者或读者的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可以对文学文本的生产做出贡献?
3. 文学在何种程度上是“自主的”? 文本的形式和结构特性是什么? 一个文本的结构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

问题1所关注的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问题2关注的是心智与文学的关系; 问题3关注的是文学和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关系。这都关乎认知视角下文学性的内涵和研究内容。而问题1明显具有探讨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哲学诉求, 问题2的哲学性体现在试图建立创作和审美主体的心智与文本的直接联系及与客观世界的间接联系(这一间接联系体现于文本)。因此, 我们对于认知视角下的文学性的界定和研究既兼顾传统文论的核心关切, 又有科学精神(认知科学), 同时试图将文学置于哲学的宏大视阈, 体现了文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向。换言之, 从形式主义诗学体系出发, 我们发现由诗歌语言的独特规则和形式所带来的文体及审美差异是“文学性”这一术语的肇始含义。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石, 上文所论及的文学作品特有的概念化方式和特征以及以此为哲学的哲学启示则可以被看做是“文学性”在认知维度的新发展, 这两者是本文所阐述的中心内容。

实际上, 通过认真梳理文论, 我们发现这一“文学性”理念在传统文论中也能找到有效的映证, 只不过这些观点相对零散, 未能形成独有的体系和理路, 这也正是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诗学)可以为传统文学研究做出的贡献所在。例如, 新批评派著名学者 I.A. 理查兹指出:

为什么诗人使用这些字眼而不用别的字眼? 并不是因为这些字眼本身代表了诗人想表达的一系列思想。重要的绝不是一首诗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它是什么。诗人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写作。诗人使用这些词语是因为诸种兴趣(它们的运动就是诗歌的形成过程)联合起来, (恰恰以这样的形态)作为安排、控制、巩固被言说的经验的一种手段而把这些词语带入诗人的意识, 这些词语本身也是被言说的经验的一个主要部分。

(转引自赛尔登 142-143)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理查兹认为诗歌的词语并不直接代表思想，而是作为“被言说的经验”的组成部分进入了诗歌的构建。这里，词语所对应的“经验”与上文所言及的“对世界进行概念化”本质上都可以被视为来自于人们与世界的互动，而正是因为这些被“安排、控制、巩固”的被言说的经验，诗歌成为了诗歌，而非科学写作。更进一步分析，所谓被“安排、控制、巩固”的被言说的经验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正是具有认知属性的“文学性”的体现，这是因为“经验”是人类心智对于客体和运动的概念累积、修正和整合过程的产物，而对这些经验的“安排、控制、巩固”则反映了概念化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操作。换言之，这些经验经过了特定的认知操作而反映为诗歌的语言，成为文学区别于别的语言形式的一种标志。这一结论非常接近于在文学批评领域提及的诗歌的精神层面意义。

国内学者也有着相似的关切。杨匡汉在《中国新诗学》中认为：“（诗歌）记录着历史的沧桑，映现着人类的智慧，凝聚着时代的文明，标志着人性的深度。”以此为基础，他批评了现代诗歌“细碎、杂乱、破裂、平涂以及想象力匮乏和无抒情的失语”等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要依靠“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文的生态问题提上议事与实践的议程”（408-409），并充满希望地主张“诗学生态”成为诗歌创作与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这一看法表明，诗歌作为智慧和人性的产物反映出人类在客观世界里所经历的历史和构建的文明。换言之，诗歌是客观世界经过智慧和人性加工后的产品，反映的是被概念化的世界。其次，他提出的“诗学生态”在“自然的、社会的和人文的生态问题”上的关注，本质上是哲学对于诗学的重构，是人类在诗歌中所体现的关于自我和世界复杂关系的概念组织方式和过程。

结语

本文沿着雅各布森对于“文学性”的形式主义定义一路走下来，运用认知诗学和语言学理论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全新的阐述，提出了文学性是文学语言 - 概念化 - 哲学思考的连续统。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有三大特点：1）呼吁文学研究回归语言和文本；2）强调概念化和哲学思考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3）帮助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打破壁垒，以期得到更丰硕的成果。但同时我们的讨论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如何运用概念化这一认知工具去细致讨论审美体验等。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语言学的发展能成为文学研究可以持续借鉴的理论基石，语言学的自身发展也可以通过文学研究的深入而广泛获益，从而让这两大彼此关联很深但交集尚浅的学科通过深度联姻带来全新的研究成果——而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只是第一步。

【 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Gavins, Joanna, and G. Steen.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 高原: “古典诗歌中数量名结构概念合成的绘画美”, 《修辞学习》6 (2009): 23-29。
- [Gao Yuan. “On the Aesthetics from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of Numeral Nouns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Rhetoric Studies* 6 (2009): 23-29.]
- Hogan, Patrick, and F. L. Aldama. *Conversations on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 P, 2014.
- 胡涛: “雅各布森与‘文学性’概念”, 《外国文学研究》3 (2014): 37-45。
- [Hu Tao. “R.Jakobson and Literarines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2014): 37-45.]
- Jakobson, Roman, “Poetry of Grammar and Grammar of Poetry.” *Language in Literature*. Ed. 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 Cambridge: Harvard U P, 1987.
- Lakoff, Gorge.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Chicago U P, 1987.
- Langacker, Ronald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 P, 2008.
- 刘正光: “非范畴化与汉语诗歌中的名词短语并置”, 《外国语》4 (2008): 22-30。
- [Liu Zhengguang. “Decategorization and Noun Phrase Juxtaposition in Chinese Poetry.”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2008): 22-30.]
- 马汉广: “文学性”概念的多重蕴涵与当下意义”, 《文艺研究》7 (2014): 31-40。
- [Ma Hanguang.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riness and its Current Meaning.”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7 (2014): 31-40.]
- 拉曼·赛尔登: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刘象愚, 陈永国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Raman Selden.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Trans. Liu Xiangyu, Chen Yongguo. Beijing: Peking UP, 2003.]
- 史忠义: “‘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 《中国比较文学》3 (2000): 122-128。
- [Shi Zhongyi. “My View on ‘Literarines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00): 122-128.]
- 束定芳: 诗歌研究的认知语言学视角——以汶川地震诗歌现象为例, 《外国语文》2 (2009): 1-5。
- [Shu Dingfa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Poetics: a Case Study of Post Wenchuan Earthquake Poem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2009): 1-5.]
- : “境界”与“概念化”——王国维的诗歌理论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化理论, 《外语教学》7 (2016): 1-5。
- [—, “Jingjie and Conceptualization: Wang Guowei’s Poetic Theor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7 (2016): 1-5.]
-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 *Texture: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Rea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 P, 2009.
- Talmy, Le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0.
- Tsur, R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Turner, Mark. *The Literary Mind*. Oxford: Oxford U P, 1996.

熊沐青：“‘从解释到发现’的认知诗学分析方法——以 The Eagle 为例”，《外语教学与研究》5（2012）：448-459。

[Xiong Muqing. “Analytical Technique of Cognitive Poe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Eagl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5（2012）：448-459.]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Yang Kuanghan. *Neo-poetics of China*.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张旭春：“从语言结构到诗性结构——索绪尔语言理论及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诗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1990）：102-108。

[Zhang Xuchun. “From Language Structure to Poetic Structure: Saussure’s Linguistics and Jakobson’s Structuralist Poetics.”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3 (1990): 102-108.]

责任编辑：陈 晞